

怀悲悯之心观人说事
现代悲剧意识日趋复杂
看华人文学五彩缤纷
隔海跨洋仍现血脉相连



南中国学术文丛

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

王列耀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

王列耀 / 著

文化艺术出版社

Culture and Art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王列耀著. —北京: 文化艺术出版社, 2005. 3
(南中国学术文丛)

ISBN 7-5039-2760-7

I. 宗… II. 王… III. 宗教文化-影响-中文-文学研究-东南亚 IV. I330.6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5) 第 043096 号

宗教情结与华人文学

著 者 王列耀
责任编辑 董瑞丽
责任校对 崔建文
版式设计 宝 华
封面设计 彩多设计
出版发行 文化艺术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北里甲 1 号 100029
网 址 www.whyscbs.com
电子邮箱 whysbooks@263.net
电 话 (010) 64813345 64813346 (总编室)
(010) 64813384 64813385 (发行部)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宏达印刷有限公司
版 次 2005 年 3 月第 1 版
2005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 张 21.75
字 数 310 千字
书 号 ISBN 7-5039-2760-7/G·512
定 价 30.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印装错误, 随时调换。

目录

第一编 宗教文化与现代作家

- 一、耶稣受难与鲁迅的英雄叙事 3
- 二、冰心：复杂的杂糅之爱 13
- 三、梁实秋与中国现代悲剧意识 38

第二编 宗教文化与中国话剧

- 一、对中国话剧的影响 49
- 二、对中国话剧悲剧意识建立过程的影响 61
- 三、“罪”意识与中国现代戏剧悲剧观 79

第三编 台湾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 一、台湾地区宗教的渊源 93
- 二、“出世意念”的新质 98
- 三、对东方智慧的探寻 105

第四编 香港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 一、基督教文化与香港地区文学 117
- 二、《文艺》杂志与香港文学 125
- 三、梁锡华：挥之不去的宗教情结 133

第五编 泰华文学中的宗教情结

- 一、陈博文：入佛出佛，交映生辉 151
- 二、陈博文与泰华“佛幻现实主义”小说 160

第六编 台湾：女性文学

- 一、台湾女性文学中的母性审视 171
- 二、郭良蕙：悲剧故事与牧歌情调 181
- 三、李昂：救赎的困惑与理性的探寻 193
- 四、掀起过轩然大波的“龙卷风” 202
- 五、钟玲：实践一种新的批评精神 213

第七编 香港：都市文学

- 一、都市诗：城市与人的姿影和心态 231
- 二、士人散文与市人散文 245
- 三、学者杂文或小品文 250
- 四、曾敏之的“文人散文” 257
- 五、陈浩泉：《香港九七》 264

第八编 海外：华人文学（上）

- 一、东南亚华文文学：华族身份意识的转型 271
- 二、东南亚华人文学的“望”“乡”之路 283
- 三、印尼土生华人文学曾经的“寻根”之旅 295

第九编 海外：华人文学（下）

- 一、李永平：“半个支那”与“拉子妇” 311
- 二、戴小华：不断地注视华人与社会的蜕变 324
- 三、《幸福出售》与新加坡华文小说 329
- 四、《赤贫儿女》与泰华文坛的“南部风” 333
- 五、严歌苓：女人的被“牧”与“自牧” 339

第一编

**宗教文化与
现代作家**

一、耶稣受难与鲁迅的英雄叙事

鲁迅小说叙事多近似俄国果戈理、契诃夫，即着力于小人物的不幸与受难。在鲁迅的小说叙事中，又有貌似果戈理、契诃夫笔下的小人物，却又不是真正的小人物，而是代表着时代精神的英雄，且是不幸与受难的英雄。

（一）英雄认定与英雄受难

不同的文化传统、不同的时代，以至同一时代的不同人群，对英雄的定义各有不同。悉尼·胡克把英雄人物划分为历史上行动方面的英雄和思想方面的英雄，并且将前者称为“事变性人物”，将后者称为“事变创造性人物”。“所谓事变性人物就是：某一个人的行动影响了以后事变的发展；而如果没有他的这一行动，事变的发展进程将会因之而完全不同。”“所谓事变创造性人物就是这样一个事变性的人物，他的行动乃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发生的后果，而不是偶然的地位或情况所促成的。”他还特别指出：“我们所谓历史上的英雄或伟人仅指

事变创造性人物。”^①

启蒙运动在中国社会由近代向现代的转轨过程中，以巨大的声势、极强的荡激力，发挥了巨大作用。拨动了近、现代中国历史的车轮，又被挤夹在近、现代中国历史车轮间的启蒙运动，有着两次高潮。实际上，是呈现为启蒙运动自身的两个历史性阶段。其一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遍而深刻的社会启蒙阶段，萌动于龚自珍的“更法改制”，壮阔于1895年至1898年的“公车上书”、“上喻变法”、“百日维新”；其二为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普遍而深刻的思想启蒙阶段，涌动于梁启超的“新民”之说，奋进于1915年至20年代前期。社会启蒙的核心是政治改良，策略为推动一场自上而下的政治运动；思想启蒙的主要视点为重塑伦理道德和文化精神，策略为发动一场革新思想的“国民运动”。

参照启蒙的直接目的，我们将社会启蒙的发难者称之为启蒙政治家，将思想启蒙的发难者称之为启蒙思想家。既发难于“百日维新”，又始作“新民”说的梁启超，左挑右扛地担负过两个角色。

梁启超对英雄的认定近乎悉尼·胡克的事变性人物：像一个获得了支点的杠杆一样，去完成拨动事变与发展的任务。在叙说自己的感怀与承担时，既显露着他以创世英雄为己任的心态，也透露了他的英雄观内涵：“启超常持一论，谓凡任天下事者，宜自求为陈胜、吴广。”^②更有诗曰：十年之后当思我，举国欲狂欲语谁。

梁启超之后的启蒙思想家，同样以天下为己任，以英雄甚至救世者自居：“文学革命的发难者胡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周作人、刘半农、钱玄同等，都不是纯文学家，而首先是‘有所为’的思想启蒙家，都不以文人自喻，而以救世者自居的。”^③ 同样他们希望一个获得了支点的杠杆。然而，这根杠杆不是物质的杠杆，而是思想的杠杆。其行动不一定是“拨动”，更可能是“牵引”——是智慧、意志和性格的种种卓越能力所引发的后果。

鲁迅对“个人”与“众数”的区分，“任个人”、“排众数”的鲜明

① [美]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108~11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② 《饮冰室合集·与严又陵先生》。

③ 马良春等主编：《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上册，第133页，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主张，标志着鲁迅对“事变创造性人物”的认同。“与其抑英哲以就凡庸，曷若置众人而希英哲？”“不若用庸众为牺牲，以冀一二天才之出世，递天才出而社会之活动亦以萌，即所谓超人之说，尝震惊欧洲之思想界者也。”^① 鲁迅以“英哲”、“天才”置换了梁启超的陈胜、吴广，也以“超人说”的思想“牵引”换下了“当思我”的物质“拨动”。

这种英雄认定的分野，清晰地反映在梁启超、鲁迅对基督教的认同中。

19世纪末期，在西方文化的猛烈冲击下，梁启超作为一个具有强烈爱国情感的知识分子，在认同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对基督教采取了比较开明的态度——既抗拒又接受。产生这种“开明”的原因，一方面是因“在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本质底下，传教士抱着优越感，谋求将本身信仰的一套观念与理想迫使中国人加以接受。在另一方面，19世纪绝大部分的中国人，要接触或是要了解西方文化，都必须凭藉通晓华语的传教士”^②。如果再深入地追究一番，还可以说梁启超意在以基督教为参照系，试图将儒学建成为一种制度化的儒教，从而构建一个合用的物质性杠杆，去豪气满怀地拨动历史的车轮。

梁启超不像前人或同时代人盲目地反对基督教。在所撰写的《西学书目表》中，认为在四百多种翻译西籍中，最佳者为李提摩太的《泰西新史揽要》。在基督教发展史中，梁启超特别注意宗教形式可以救国救民的经验、拨动历史的力量：

所论西教之强，凭藉国力，是固然矣。然亦有其本也。耶氏之起，犹太人疾之滋甚，其大弟子十二人，死于法者十一，……而其精悍锐狠之气不衰，保罗以私淑之徒，纵横排荡，以昌其教，其继起者，皆以死自任，历三百年而后有甘站丁沙曼之徒，以国土而信其教者，自后教皇之权日益尊重，至于各国君主感受加冕，于是国力之盛极矣，而不知其初之累受逼迫，皆一二匹夫之贱，百折不回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5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② 邓永康：《戊戌变法前的梁启超与李提摩太》，载香港《崇基学报》，1974年第1、2合期。

以成之者也。^①

与梁启超比较，鲁迅是第二代接受西学的近代知识分子——是与西方文明的各种形式有过多种接触的新知识分子。此时的传教士，已失去了昔日西学输入者的桂冠。鲁迅不必借助传教士研究西学，但对基督教文化非常着意，他采取的是既抗拒又接受的立场。

鲁迅在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试图以新的角度与方法重估中国的传统，在《文化偏至论》中，提出了“任个人而排众数”的主张。这时的鲁迅，亦试图用新的角度与方法重估西方的传统，遍观从“世纪之元”经“教皇”“制御全欧”，再由路德改教到英、法“革命”的西方社会思想发展史，鲁迅对以“众数”排“个人”的教会、教皇之类的“宗教之系缚”，如同对中国的传统一般憎恶，指出：“当旧教盛时，威力绝世，学者有见，大率默然，其有毅然表白于众者，每每获囚戮之祸。递教力堕地，思想自由，凡百学术之事，勃焉兴起……”^②就此而言，鲁迅比梁启超、陈独秀都更注意也更反感基督教会对于西方社会、思想曾有过的漫长压抑与摧残。

从“任个人”出发，鲁迅抨击制度化的教会和教会统治，却赞赏基督教的肇始者耶稣在孤独中的开创精神，并将其视作与“众数”相对的为数不多的“个人”：“一梭格拉第也，而众希腊人鸠之，一耶稣基督也，而众犹太人磔之，后世论者，孰不云缪，顾其时则从众志耳。”^③

耶稣受难——众犹太人磔之，曾反复出现在鲁迅的作品中。1919年，也就是说《药》问世的同一年，在《暴君的臣民》中，鲁迅说：“暴君治下的臣民，大抵比暴君更暴；暴君的暴政，时常还不能满足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欲望。中国不要提了罢。在外国举一个例：……大事件则如巡抚想放耶稣，众人却要求将他钉上十字架。”^④ 1922年的反宗教运动，使不少曾欢迎过基督教思想、文化的知识分子改变了态度，不谈而少言基督教。陈独秀便是其中之一。他由赞扬耶稣高尚及伟大的人格，

① 《饮冰室合集·复友人论保教书》。

②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4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③ 同上，第52页。

④ 同上，第366页。

改为支持成立“反宗教大同盟”，从新的社会立场重新评述基督教。鲁迅在此前没有像陈独秀那样专门撰文研谈、介绍耶稣与基督教，而在反宗教运动过去两年时，则撰写了一篇标题为《复仇》（其二）的散文诗，详细地叙说了最能体现耶稣“高尚及伟大的人格”的“耶稣受难”一事。

在鲁迅的观察中，耶稣是个牺牲者、受难者，是一个因“思想”而触怒“众数”，导致因酷刑而受难的“牵引”性英雄，是悉尼·胡克所谓担负“事变创造性”任务的“个人”。

梁启超在《新民说》中，关注的焦点是“群”这一集体主义概念。他在对个人权利与自由做出激动人心的辩护时，总带着一种强烈的集体主义特色：“一部分之权利，合之即为全体之权利，一私人之权利思想，积之即为一国家之权利思想。故欲养成此思想，必自个人始。”“团体自由者，个人自由之积也。”^①正如有研究者认为：“人们可以从集体主义的观点拥护民主，而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首先并且最主要在于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制度化——公民的权利和自由。”^②也就是说，持着“体”、“用”之见的梁启超，与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仍有着一段较长的距离。当寻找西学的大潮走向“信仰个人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制度化”时，他的孤独既有落伍的凄惶，也有丧“体”的失望，是一种无奈与消沉的孤独。

鲁迅的出发点，离“集体主义”、“群”的传统远了，离“西方自由主义的核心”却较近。国之英雄，国人“鸠之”；民族之英雄，族人“磔之”；是国之不幸，民族不幸；却又是国之幸事，民族之幸事。“一二天才”，毕竟从“鸠之”、“磔之”中凌空“出世”；属于新世纪的梭格拉第、耶稣基督，也恰是在孤独中宣示出普世的福音。

这样，“个人”受难、英雄受难、耶稣受难便获得了多重存在意义：受难者与英雄不可分，英雄的话语便是受难话语。受难与“牵引”不可分，“牵引”意味着受难，受难暗藏或包蕴着历史性的“牵引”。这个意义便凝聚在鲁迅为数不多，却极具个性的英雄受难小说《狂人日记》与

① 梁启超：《新民说》，第36页、第46~47页。

② [美]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第136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药》之中。

（二）悖反与受难叙事体

“事变创造性人物”的所作所为固然重要，更为重要的是他们本身的智慧、意志、性格和思想在与“众数”相对时所具有的超越性。因超越，而卓然特立；因超越，而成为出乎“众数”的“个人”。但是，超越既产生“牵引”，也必引起超越者的受难。

1908年的《文化偏至论》之后，鲁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保持与发展着对“个人”与“众数”的看法。1926年重印《工人绥惠略夫》时写道：要救群众，反而被群众所害。话语之中，显见对英雄境遇——孤独的痛惜。然而，深入一层，却依然透露着对时代英雄基本特性的确定：超越与受难。

假设这个基本“确定”能够成立的话，我们不难看到，文学家鲁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开山之作《狂人日记》中，便已奠定了他诗化、圣化英雄的基督情境模式：超越与受难。超越是超越同时代人，超越现存的世界秩序，对新的世界秩序处在一种渴望与知觉当中。“凡事总须研究，才会明白”，是“狂人”超越性的起点；“仁义道德”等于“两个字是‘吃人’”，是狂人超越同时代人、超越现存世界且知错必改的根本表征。其实，这个起点与表征不仅是“狂人”的，根本就是鲁迅本人的，直到1925年，鲁迅对“仁义道德”等“中国的文明”仍在反复研究，结论仍是：“所谓中国的文明者，其实不过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所谓中国者，其实不过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并且认为：“这人肉的筵宴现在还排着，在许多入还想一直排下去。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席，毁坏这厨房，则是现在的青年的使命！”^①

“中国的文明”等于“吃人”，“中国”等同于吃人者的“厨房”，话语尽管偏激，产生于“五四”之初并继续于“五四”之后，无疑代表着划时代的理性精神。然而，“在他们同时代人的清醒头脑中，这种神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216页、第217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圣的理性看来好像是疯狂似的”^①。伟大的时代召唤出时代的代表性人物，这些时代的代表，以自己的特殊目的表现时代的灵魂的风格。然而，他们不是从现行秩序、制度所认同的沉静有常的事物进行中表现时代的灵魂，而是以一种悖反的方式，忠诚于隐藏着还没达到现实存在的那个内在的“精神”，那个冲击着表象世界又依然潜伏在地面之下的内在精神。《狂人日记》中的狂人，是这样一个叛逆者。“狂人”在“同时代人的清醒头脑中”只能是个疯子。在“赵贵翁”、“陈老五”、“大哥”，甚至“母亲”等“清醒”者的汪洋大海般的包围下，“狂人”不单感受着孤独，而且还受到围剿。在谩骂、囚禁中，忍受肉体与精神的折磨：在吃人者的砧板上，无可奈何地任由吃人者玩弄与审判。

这样，悖反在鲁迅的英雄小说中具有至上的意义：神圣的理性呈现为荒谬的疯狂，时代的英雄成为社会的公敌。换句话说，如果失去这种悖反，作品塑造的人物也就不能称其为时代的英雄。同样，悖反的孤独，才是英雄的孤独。《药》中的夏瑜，也是这样的孤独英雄。

人们较重视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与鲁迅的《狂人日记》的比较。确实，在二者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如篇名的设定、日记体的结构、受难的语境、救救孩子的呼声等等。更重要的是，两位“狂人”既是真实的“小人物”，也都是作者的传声筒，借“狂人”的心与“嘴”针砭现实、批判现实。

但是，不应忽视，果戈理的“狂人”，充其量也只是受难的“小人物”，不能成就为受难的英雄。主要原因就在于果戈理的“狂人”没有承担着鲁迅所设定的“悖反性”。如果说果戈理的“狂人”也在不停地“研究”什么的话，他研究的主要是自己为什么只是九等文官抄写员，而不是什么伯爵、将军或国王。他的疯狂不是与超越和理性相连相悖，而是与中国式的阿Q们的愚昧、落伍血肉粘连。因此，此“狂人”的孤独，非各国启蒙思想家所忍受的孤独——英雄的孤独，而恰恰是“众数”、“小人物”、落伍者在病态社会形成的病态心理的反映。

鲁迅的小说，多采用“受难叙事体”。由于对“个人”与“众数”

^① [美] 悉尼·胡克：《历史中的英雄》，第4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的认定，鲁迅的受难叙事体小说，也就产生出“个人”受难叙事与“众数”受难叙事两大类型。从果戈理、契诃夫等俄国作家那里，鲁迅将“小人物”的受难私事“移植”到了自己的“众数”受难小说之中，并成就了《孔乙己》、《祝福》、《阿Q正传》等“众数”受难小说。

“个人”受难叙事，其“悖反”的准则，不是来自果戈理、契诃夫。如果追溯本源，可以挖掘的应该是《圣经》为文学提供的世界性母题：基督受难叙事。

《圣经》为文学提供了许多世界性的母题，最为突出的是上帝与魔鬼的对立和基督受难。“这两个母题所以是世界性的，是因为它们体现了世界各民族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群体意识，或者说体现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的人类意识。”“《圣经》的世界性母题当然不只是这两个，但以这两个最为重要，影响最为深远。用宏观的眼光看世界文明，其他民族的文学很少具有这样突出的世界性母题。”^①

在基督受难叙事中，悖反原则异常鲜明：神圣的理性呈现为荒谬的疯狂，神圣的救世主成为被救者的公敌。

在基督教世界，神圣的理性只能来自上帝。耶稣承担着拯救众生的神圣使命，“道成肉身”来到尘世。“主耶稣基督乃是上帝对人类最完备的启示”。“易言之，基督救世，便是那位创造天地万物的全能至尊的上帝，已实实在在地亲自来到他所创造的世界。”“我们可以凭我们的肉眼，确确实实地看到那位从来没有看见的上帝。天下还有比这更奇妙的事吗？天下还有比这更大的恩典吗？”^② 耶稣代表上帝向人类直接启示救世圣道，可谓神圣至极、理性至极。然而，神圣与超越的结果，则被转化为荒谬、疯狂、公敌。救世主在“庸众”中领略的是从未品尝过的孤独与折磨：门徒犹大为了三十块血银而卖主，门徒彼得在众人面前三次不认主。众人宁愿要求释放一个囚犯，而坚持要将耶稣送上十字架。定罪的全部理由只是耶稣说了一句真话：“我是神的儿子。”因为这句真话代表着神圣的理性，神的儿子耶稣便陷入了谩骂、围攻、唾弃、背叛的汪洋大海中。

① 李万钧：《欧美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第39页，福建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② 章力生：《基督论》，第27页，香港宣道出版社1990年版。

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便认为《圣经》“幽邃庄严胜”、“灌溉人心，迄今兹未艾”^①。并取“叛道”之说，论及上帝与魔鬼对立的母题及其在弥耳顿（失乐园）中的延续。在《文化偏至论》中，鲁迅对基督受难母题深有感触，对“众犹太人磔之”深感荒谬。配合着“排众数”的情结，鲁迅终于在1924年女师大事件的刺激下，作散文诗《复仇》（其二），畅快淋漓地演绎一遍隐身于小说中数年的基督受难母题，并且还发挥性地将十字架上的耶稣推向人神“共弃”的绝顶孤独中。

基督受难与狂人受难，其原因都是因为一句话，都是因为一句真话。耶稣说：“我是神的儿子。”狂人说：仁义道德“吃人”。公元初年，众人容不得耶稣是上帝之子这个“真理”；20世纪初年，“众数”也容不得仁义道德吃人这个真理。考虑到启蒙思想家习以“救世者”自居的心态，我们不难看出：鲁迅“个人”受难叙事或称英雄受难叙事中的彰论，正晃动着基督受难叙事中悖论的精髓。

惟一区别的是，耶稣在孤独与悖论中被送上了十字架，狂人在孤独与悖论中仅仅被囚禁。但是，随着启蒙运动的发展，鲁迅的英雄受难叙事也在前行。待到《药》时，夏瑜便与耶稣一样，在孤独与悖论中被悬挂在十字架高处。

《狂人日记》之后刚好一年，鲁迅的第二篇英雄受难小说《药》问世了。我们依然可以说《药》中有一明一暗两条线索，也可以说夏瑜只是暗线中的人物。但是，作为一位为大众谋求解放并献出宝贵生命的先烈，夏瑜的英雄身份，而且是受难英雄的身份无可争议。

假如把《狂人日记》和《药》连接起来阅读，或者将两篇小说作为系列的“个人”受难叙事来解读，那么，从历史情景与文化语境来看，夏瑜就是那个被囚禁过的“狂人”命运的延伸，但是，他比“狂人”更加成熟、更加坚定、更加懂得战斗。《药》中的“众数”很明白这一点，他们已为夏瑜“病”加一等，实际也是罪加一等，由暂时的狂到完全的疯。

“‘简直是发了疯了。’花白胡子恍然大悟似的说。”

① 《鲁迅全集》第一卷，第64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发了疯了。’二十多岁的人也恍然大悟的说。”

发“狂”还可治愈，发“疯”则必须斩头。夏瑜确实也被砍了头。《药》比之《狂人日记》，称得上是一篇更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受难叙事小说。

夏瑜在《药》中，最为动人的情节不是他在刑场如何英勇就义。鲁迅对小说情理中的高潮——就义，进行了虚掩处理。而对夏瑜就义前，类似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愚拙”一事，进行了强化处理。面对“暴君的臣民”，夏瑜一边忍受着精神与筋骨的折磨，一边展现出近乎“愚拙”的怜悯与爱心，连说：“可怜，可怜！”他可怜的不是正挨打、将被杀的自己，而是打他、杀他的众人。这种类似耶稣十字架似的愚拙，也是愚拙的反语，愚拙中同样流溢的是愚拙者的伟大与超越。在康大叔、花白胡子等人的嘲弄、谩骂中，这种愚拙更显得回肠荡气、超凡越俗，小说的主题正是从这里发生了深化。“血馒头”之明线，也因此与暗线混作一体，产生出强烈的对比、反衬效应。耶稣基督受难叙事，也就这样流润进了鲁迅的“英雄”受难叙事之中。